

新闻与政要

■ 施亚康 著

■ 江苏文艺出版社



登丹的士與史丹林曾照為俄國革命後
英國機師紀第一道特爾大員的訪問。

目 录

- 前言 1

-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奠基人 7
《莱茵报》：马恩新闻实践起点——《德法年鉴》：转向唯物主义和
共产主义——黄金搭档——坚持用报刊干预运动指导运动——
为党报的无产阶级化而斗争

- 李卜克内西——“不倦的战士和领袖” 72
从晚报记者到《人民报》主编——道不合不与为谋——庄严的使
命——反对不义之战，捍卫国际主义——巴黎公社的英勇卫士
——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传播者——“非常”时期的斗争——奋斗
到最后一息

- 列宁——全苏记协的第一号会员 111
传单：工人报刊的先驱——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前进！高
举布尔什维克旗帜——布尔什维克报刊的兴盛——担任元首之
后

- 斯大林——是“钢铁”，也是宣传家 143
走《火星报》之路——黑暗中的号角——让真理大放光芒——迎
接决战的到来——准备！向反动派开火——报纸揭开起义的战
幕

- 毛泽东——为中国新闻史竖起一座丰碑 161
报纸为他敞开了新天地——吹响反帝反封建号角——坚守阵地，不屈斗争——代部长和《政治周报》——是领袖又是记者——从实践到理论：我党新闻学奠基人——毛泽东与记者朋友

- 周恩来——“一张报纸抵得上一个方面军” 219
初试啼声，即显才干——一张全国最好的学生报纸——出色的旅欧记者——从《少年》到《赤光》——武汉撤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高超的斗争艺术——在周副主席领导下改版——长夜明灯播火人——宝贵财富，精心爱护

- 孙中山——“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 276
《中国日报》：中国第一张革命报纸——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伦敦蒙难与《地球报》——同盟会和《民报》——《民报》与大论战——“与国同春”——迎着新的曙光

- 富兰克林——美国开国元勋报业先驱 304
自学成才——从学徒到办报尝试——独闯费城——《宾夕法尼亚报》新生——蛇的漫画：“不联合即死亡”——富兰克林与托马斯·潘恩

- 丘吉尔——从新闻记者到政坛巨擘 326
古巴而印度：第一部通讯集——非洲寻梦——写作赚钱，自费巡视——宦海失利，重返现役——在大火与消防队之间——政务繁忙，笔耕不辍

- 戴高乐——一位与新闻界抱有敌意的总统 351
追溯历史,事出有因——历史的比较——偏见导致轻视——深受冷遇的法国记者——怪圈效应

- 罗斯福——美国新闻界的“头号总编辑” 383
办《红色哈佛报》:从事公职的最好准备——智囊·温泉疗养和记者朋友——操纵新闻的头把好手

- 尼克松——被新闻冲垮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405
倒楣的西部佬——泄密与反泄密——水门事件与新闻界的穷追猛打——经济攻势——外国政要眼中的水门案

- 附录:

- 墨索里尼——靠新闻起家的法西斯党魁 439
野心初露——投机获利——夺权跳板——呼风唤雨——加速右转——严控舆论——造神运动——舆论·娼妓——垂死挣扎

- 戈培尔——恶魔的吹鼓手 478
巧于投机,平步青云——“纳粹化”的急先锋——二战前夕的“杰作”——示假隐真,妖言惑众——忠实的鹰犬——大祸临头,垂死挣扎

- 后记 505

前 言

大千世界，政海波涌云诡，变幻莫测。新闻无时无刻不在敏锐地感触和反映着政海风云。

在近、现代史上，每一个产生过重要历史影响的政治集团几乎都和报刊活动紧密相连。搏击政海风云的政治家们，不管其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无不与新闻结缘。中国外国，各个阶级，概莫能外。

纵观近代以来世界政坛要人中，从新闻界步入政界的数不胜数，也有不少退出政界后又重操旧业；有的以新闻媒介为武器，批判旧世界，为创立新世界大造舆论正确引导历史向前推进，有的则把新闻舆论作为“娼妓”，翻云覆雨，颠倒黑白，造谣惑众，兴风作浪；有的政治家靠新闻平步青云，荣登高位；有的则被新闻舆论打入冷宫，抱憾终身；有的熟练地操纵新闻媒介，在政坛上纵横捭阖，叱咤风云，导演出一幕幕波澜壮阔的活剧，有的则被新闻界掀起的舆论浪潮抛上抛下，忽儿波峰，忽儿浪谷，甚至被抛入宦海“百慕大”……

凡历经磨难，成就事业的政界要人，无不饱尝过其中的甜酸苦辣。

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

我国古代西周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公懂得，“民口”（舆论）猛于洪水（川）。孙子兵法云：攻心为上，攻城次之。说的是用舆论攻势瓦解敌方军心斗志乃战争之首要之着。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甚至把舆论看作是政治法、民法和刑法之外的第四种法律，他认为，舆论是“国家真正宪法”。

近代，我国维新派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从变法开始，就注重抓舆论，指出：“舆论者，天地间最大之势力，未有能抵御者也。舆论一成，则虽有雷霆万钧之威，亦敛莫敢发。”舆论之力是“社会制裁之力”，它能“使人不敢为真小人”，“其功用已不可谓不伟”。

毛泽东则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高度强调舆论的重要。他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没有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就没有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没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中国就没有辛亥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一部《常识》，推动了美国独立战争；一部《汤姆叔叔的小屋》，点燃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解放黑奴的战火……

而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广播电视是重要的舆论载体。具有反映、影响、引导舆论的功能。一场强大的新闻舆论攻势，能影响社会，影响政局。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难怪西方学者这样来评价世界著名大报的能量：“跺一脚地动山摇。”此说虽不无夸张，却非戏言。

因此，凡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无不重视舆论的作用，无不重视舆论传媒的作用。无产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这样；夺取政权需要如此，巩固政权同样必须如此。

近代以来，随着报业等新闻传媒的兴起和发展，政治家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杰斐逊说，在美国，报刊是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

叱咤风云的拿破仑说：“报馆一间，犹联军一队也！”在他看来，“报纸相当于一支三十万人的军队；一支三十万人的军队在安邦定

国，对外威慑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比不上半打受雇的蹩脚的记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新闻战卓有成效，德国人懊丧地称英国报王诺思克利夫勋爵任总监的英对敌宣传部为“德国信心破坏部”。战后，德王威廉二世曾有如下喟叹：德国之战败，就在于没有一张《泰晤士报》。

被新闻舆论拉下马的尼克松体会更深：“我认识新闻界的领袖……他们对世界的影响要比许多国家的领袖大得多。”“今天，不论是谁，只要他们没有作好被传播媒介无情揭露的准备，那就不应当踏入政界。”

美国的政要和学者甚至认为，美国是记者缔造的；美国的历史是新闻记者的历史。

康有为、梁启超认为，要开风气，非合大群不可；要合大群非开会（组织社团）不可；要开会，非有报纸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溃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马克思恩格斯曾特别强调：报纸每日都能干预运动，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反映当前的局势……。把出版党的机关报视为“工人阶级有觉悟的组织迅速发展的最好证明”。

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诞生以后，就为创办机关报问题大声疾呼：“目前整个的关键在于这一机关报。没有它，我们就会走向不光彩的必然的死亡。”他后来又反复指出，“没有政治机关报，就不能有称得上政治运动的运动。”

毛泽东历来重视报纸的作用和力量。认为报纸“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对于党的工作和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是“反映和指导政治经济工作的武器”。

周恩来强调：一张党报抵得上一个方面军。

.....

虽然不同阶级的政治家，出发点和目的不同，但对于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新闻事业的论述、评价，大多堪称卓识说论。

因此，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都竭力使用新闻这个武器为本阶级服务。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从投身政治起，他们的革命活动始终伴随一系列的报刊工作。马恩创办、指导过的党报有十几种；列宁一生创办指导过的党报多达40种。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和报刊结下不解之缘。他重视从报刊学习知识，了解世界，获取各种信息。在读师范时，节衣缩食，将父亲给他的生活费的相当部分用作订报。井冈山时期，为掌握敌方和社会各方面动向，甚至派出一个连队的兵力下山抢报，然后通宵阅读。贺子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毛泽东剪报；投身革命后，毛泽东曾积极创办编辑过多种刊物，曾把新闻记者作为自己的职业选择；以后在戎马倥偬、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为报刊通讯社撰写了大量新闻作品，被称为“编外记者”；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他为办好党报倾注了大量心血。多次号召“全党办报”，“把办报看成大事”，“用最大的力量经营之”，为此，要“第一书记挂帅”，“政治家办报”。他对报刊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具体指导，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

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办报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和办报相始终；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样高度重视利用报纸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前的近20年中，孙中山大部分精力花在办报、论战上。他远涉重洋，奔波于日本、南洋、欧美，扶持、指导革命党人的报刊活动，用革命舆论“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孙中山后来在总结辛亥革命经验

时说，“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1923年国民党改组后又强调：“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要一成。”

在一贯标榜新闻独立、新闻自由的美国，学者们指出：“自美利坚创立之时起，历届政府都企图压制和指派人员去控制宣传报道工具”，200多年来“这个控制舆论的政策从未改变过，只是随着白宫主人的变迁因人而异罢了。”李普曼，美国新闻界泰斗，最杰出的政论家。从50年代起，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都将这位《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视为上宾，优礼相待。作为回报，李忠实地宣传了他们的政见，对国内外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致使美国人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邮报》具有“一向支持政府的传统”。

自然，也有对新闻舆论不以为意，对新闻媒介傲慢冷落的政治家，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甚至是惨重代价。“以对记者毫不客气而著称”的戴高乐，由于新闻界的敌意，使事业大为减色；把“报界视为敌人”的尼克松最终成为美国总统中被新闻界拉下马的第一人。

至于那些虽重视传播媒介的作用，但把新闻舆论视作“娼妓”的墨索里尼，通过新闻宣传使人“把天堂认作地狱，把地狱看作天堂”的希特勒，认为“谎言重复千遍就变成真理”的戈培尔之流，自然逃脱不了自食其果的命运。

当今世界，虽然东西两大集团的对抗由于一方的解体而终结，但是从世界政治背景看，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依然严峻。“思想战”依然存在甚至更为深刻。东欧的急剧演变使西方头面人物进一步看到了“思想战”的威力，新闻传媒的威力。尼克松在新著《角斗场上》一书中写道：电子媒介的“爆炸性革命”，战后时代意义最大的技术发展，使“思想的传送不再跨过边界或者从地底下打过

去”，而是“从边界上空传送，而且连战略防御导弹也打不着它。西方的无线电和电视广播帮助引起了对更多的自由的渴望”，东欧人“从电视上看到的自由世界的奇迹从感情上触动了他们”。他指出“在1989年罗马尼亚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继承人的革命中，最后决战是争夺布加勒斯特电视台的控制权”。

尼克松说的是事实。西方意识形态通过新闻舆论工具的传媒，在东欧“潜移默化地赢得了骨牌效应”。

另一方面，随着东西方对抗的终结，世界两级格局解体。这种变化为发展提供了机遇。由此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重组，国际资本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动，以寻找最佳投资点。在一个全方位开放的世界里，信息交流显得特别重要。谁能更快更多地获取有益的信息，谁就把握了成功的机会。

信息传播手段种种，大众传媒总处在主角地位。

处在全方位开放中的中国，不能没有发达的新闻事业。

完全可以这样说，对新闻舆论工作、信息传播工作，重视不重视，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我们事业的兴衰。忽视它，就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近代以来数百年中，从事过新闻工作的或和新闻传媒有着特殊关系的政治家不胜枚举。我们不可能一一作详细介绍。本书选择的仅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期望读者从这些政治家的具体经历和正反经验中得到启迪。

如是，写书的幸甚。

马克思恩格斯——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奠基人

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简介：

马克思（1818—1883年），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一个犹太人律师家庭。1841年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投入政治斗争。1842年任《莱茵报》主编。其间，和恩格斯相识，结下终身友谊。《莱茵报》被封以后，于1844年初在巴黎创办《德法年鉴》杂志。1847年11月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和恩格斯一同起草《共产党宣言》。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回德国创办并主编《新莱茵报》。1864年，在伦敦创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1883年3月14日逝世。

恩格斯（1820—1895年） 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德国普鲁士莱茵省巴门的一个纺织工厂主家庭。中学未毕业即经商。1841年服兵役期间，去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小组。1844年与马克思相识后，两位导师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并肩战斗终身。1848年，与马克思一起筹备创办《新莱茵报》，为实际上的副主编。1850年11月重返英国经商，在经济上给马克思以大量无私的资助。他参加了创建第一国际的工作，又

领导建立了第二国际，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1895年8月5日在伦敦逝世。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是主要依靠自己的笔批判旧世界、批判机会主义，创立共产主义学说，指导共产主义实践活动的一生，即主要掌握和运用“批判的武器”开展政治斗争的一生。两位导师从投身政治斗争一开始，就和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不仅亲自创办编辑报刊；而且对其他共产主义者出版发行的报刊给予大量的指导和帮助，和欧美许多进步报刊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为这些报刊撰写了大量的新闻作品和经典论著。报刊实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革命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的实践和理论，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历史。

《莱茵报》：马克思新闻实践的开端

1835年10月，卡尔·马克思中学毕业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因该校校风不佳，翌年10月，转至柏林大学，仍攻读法律。

柏林大学当时处在德国思想运动前列，又是黑格尔主义的中心。校风较为严肃，学术气氛较浓。马克思在这里除了攻读法律外，对哲学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参加了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在对黑格尔哲学进行的过程中，密切接触该派核心组织“博士俱乐部”的成员。尽管马克思的年龄比他们小得多，但他的渊博知识、严密深刻的逻辑推理，坚定执着的气质，令许多人刮目相看。他很快成为该俱乐部中一名最活跃的中心人物。在这里，他

开始了最初的报刊活动，给《德国缪斯年鉴》撰稿，并筹划出版戏剧评论杂志。许多人承认他独具匠心，高人一筹，预言：“这位哲学家将在报刊和讲坛上显露头角，并且很快就会把整个德国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当时，他的好朋友，俱乐部成员弗·科本出版著作《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一书时，甚至专门附上这样的题词：“献给我的朋友，特利尔的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可见当时年轻的马克思声望已经不低。

1841年春，马克思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原计划去波恩大学任教，讲授哲学，但是，当时普鲁士当局实行反动专制政策，连一些著名的进步教授如费尔巴哈、鲍威尔等人讲授哲学都受到限制和阻挠，于是马克思终于放弃了做学者的打算，转向政治斗争。

这年九、十月间，一些自由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在莱茵省经济生活中心科伦筹办《莱茵报》。为了引起著作界和社会对报纸的关注，扩大影响，报纸的创办人格·荣克和莫·赫斯竭力动员激进人物，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参与报纸工作，为报纸撰稿。马克思受到邀请，正合心意，欣然参加了报纸的筹办工作。在他的积极推荐下，柏林大学地理教师，“博士俱乐部”成员鲁滕堡被聘为《莱茵报》主编。马克思自己，则为该报主要撰稿人。

马克思一生中正式发表文章始于《莱茵报》，^①开始发表的文章主要阐述新闻思想，矛头是指向当局的反动政策的。

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在出版自由问题上的

^① 在这之前仅发表过一篇短文，即刊登在1841年1月23日《雅典娜神殿》上的《狂歌》。大学里写的一篇，杂志未采用。

矛盾和斗争十分尖锐。为了加强对书报出版的控制，扼杀进步舆论和思想，普鲁士当局于1841年底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这一反动检查制度引起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抗争。

1842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马克思撰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文章集中抨击普鲁士的封建制度及其文化专制主义，对检查令的一些条文进行批驳。明确提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这样的文章自然不可能在国内发表，直至1843年2月，才几经辗转，发表于瑞士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1卷上。这篇文章的写作，是马克思参加政治斗争的开端。

马克思善于寻找对策和战机。1842年4月，抓住上年夏季召开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做文章。计划撰写5篇，第一篇题为《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分6次刊登在5月份的《莱茵报》上。文章批判地分析了莱茵省议会中各个等级的代表对出版自由所持的各种态度。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是人所固有的东西，不过有时表现为少数人享有的特权，有时表现为大多数人的普遍权利。自由出版物应当体现普遍自由的精神，不应当只尊重个别人的特权。文章要求制定出版法，以保证出版自由的真正实现。指出，“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认可”；而书报检查令虽具有法律的形式，实际却是“拙劣的警察手段”。文章还提出了“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的观点。认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是历史所赋予它的独特性质。文章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主张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反对让群众消极等待的自由主义策略。

这篇文章不仅是矛头直指反动当局的战斗檄文，也是一篇出色的新闻论著。

1842年年底和1843年年初，马克思又接连在《莱茵报》上发表了《〈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2组10余篇文章，批判当局的书报检查制度。

《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进步资产阶级于1837年创办的一家报纸。后被普鲁士政府当局查封。马克思就此一连写了7篇文章展开评论。^①这组文章的第一篇《〈莱比锡总汇报〉在全普鲁士境内的查封》和第二篇《〈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和〈科伦日报〉》，尖锐地抨击普鲁士当局扼杀进步报纸的罪恶，同时提出了“人民报刊”的思想。马克思指出：人民报刊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对这些东西做出自己的判决。”他强调，人民报刊的“内在规律”“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为此，必须展开斗争，“只有斗争才能使政府和人民（甚至报刊自己）相信报刊具有真正的和必然的存在权利”。

这一“人民报刊”的思想，还体现在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

1842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莱茵报》刊登了该报驻摩塞尔记者科布伦茨发来的关于该地区酿造葡萄酒农民贫困状况的3篇通讯，引起当局的严重不满。莱茵省总督沙培尔发表两则“官方声明”，指责记者和《莱茵报》“造谣中伤”和“诽谤政府”，在居民中煽惑不满情绪。马克思意识到，沙培尔的“声明”不仅表明当局无视人民的疾苦，同时也涉及到报纸的使命和记者的权利问题，不能不作回答。事前，他作了详尽的调查研究，证明记者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接着以《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为总题，在

① 这组文章见《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1卷

1843年1月15日至20日的《莱茵报》上连发几篇文章，驳斥沙培尔的指责。

文章披露大量事实，证明摩塞尔河沿岸酿酒农民备受地主剥削的惨状，然而政府不但不对他们作任何帮助，反而把农民的求助呼声说成是“无耻叫嚣”。文章指出：一个新闻记者应当而且有权利极其忠实地报道他听到的人民的呼声，报刊有责任也有权利把全部事实完整真实地揭示出来。“‘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地，它也制造这种社会舆论。”文章再次强调出版自由只能靠斗争争取的观点。指出，事实证明，“在书报检查机关公开地、长期而尖锐地和报刊冲突的地方，报刊已变得朝气蓬勃，具有坚强的性格并深信自己的力量了。”

必须指出，《莱茵报》在开始时编辑方针是不明确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气味太浓，战斗性不强，与其说是反对派报纸，不如说是政府的机关报。因而并不受读者欢迎。初期仅有400个订户。从1842年夏季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后，局面才开始改观。他连续发表旗帜鲜明的文章，在读者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同时又经常给荣克和奥本海姆写信，阐述自己的办报思想，给编辑工作施加积极影响。同年10月，马克思被聘为《莱茵报》主编，移居科伦。自此，报纸的革命民主倾向鲜明，面貌焕然一新。

这时的马克思已站到了反封建运动的最前列，并成为这一运动领导人中的左翼代表。接任主编以后，手中掌握了武器，得以大刀阔斧地对当局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进行有力的抨击。他发表了一系列体现鲜明的革命民主思想的政论性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的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以及前面提到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

省议会会议在辩论林木盗窃法案时，土地所有者极其无耻地

通过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方案，走得甚至比政府提案还远。马克思挺身而出，撰文从法律角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维护“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保证自己对森林条例违反者的控制，省议会不仅打断了法的手脚，而且还刺穿了它的心。”^①马克思维护贫苦群众的思想还强烈体现在后来发表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组文章中。

马克思主持编务以后的《莱茵报》，以其鲜明的战斗性在民主主义者和贫苦群众中赢得极大声望。其影响很快超出省界，甚至超出了普鲁士王国的疆界，成了德国民众的重要喉舌。报纸销路日广，1842年8月间，订户只有885个，到11月份，增至1820个，两个月后，印数又猛增至3400份。后来，当局对《莱茵报》下禁令时，订户把它看作是对整个莱茵省的侮辱，几千人签名向柏林请愿，仅科伦就有一千人签名反对。

普鲁士当局愈来愈感到《莱茵报》的严重威胁。就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组文章发表期间，政府于1843年1月19日作出决定，4月1日起封闭《莱茵报》。在封闭之前，报纸在接受一般检查后还要接受科伦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的双重检查；从2月起，还要受专门从柏林派驻科伦的检查官圣保罗的第一级书报检查。

在当局越来越强大的压力下，提供办报经费的自由资产阶级退却了。事实上他们也根本不赞成马克思主编的报纸的政治路线，为此，双方不时发生冲突。1843年2月12日的一次股东非常会议上，报纸发行人公开责难马克思，认为报纸与政府的矛盾的根子在马克思。马克思坚决反对对大部分股东为争取撤销查封而采取妥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78页